

宋詩話全編

壹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宋詩話全編

主編



序

詩話之爲，若徵其朔，由來已久。清中葉何文煥氏刊《歷代詩話》，其序以爲「庶歌紀於虞書，六義詳於古序，孔孟論言，別伸遠旨，春秋賦答，都屬斷章。三代尚矣，漢魏而降，作者漸夥，遂成一家之言」。何書所收，以梁鍾嶸《詩品》爲首，而宋人詩話爲最富，達十六種。蓋正名爲詩話之書，宋人實爲開山。至於爲叢編之輯，則宋人阮閱《詩話總龜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，亦爲先路之導。後世於何氏《歷代詩話》之後，又有丁福保氏《歷代詩話續編》之輯，可謂沉沉夥頤。其斷代爲編者，丁福保氏又有《清詩話》，收四十三種。郭文紹虞踵之爲《清詩話續編》，收三十四種。凡此俱選收選輯，窺豹一斑者焉。

至於欲囊括無遺，致力於《中國歷代詩話全編》之纂者，則前未曾有，而今吳文治教授乃奮勇主編斯巨帙，與全國大庠、各研究所近三百合志同方、營道同術者協力以赴，已完成《宋詩話全編》、《遼

金元詩話全編》、《明詩話全編》三大部，以視前修，誠可謂譬如積薪，後來居上者矣。近八百萬字之《明詩話全編》，已於一九九七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綉梓行世。茲則七百餘萬字、收錄詩話五百六十二家之《宋詩話全編》，問世在即，吳教授囑余一言弁首。余於宋詩，夙所篤好，連類及其詩話，曾爲《宋人詩話鳥瞰》一文，略抒蠡測。今序吳君書，第就其斷代分編之型式，選輯與全編之區分等言之。尤特旌吳教授之功在藝苑，世之治詩話學者，治詩學理論者，以至從事舊體詩寫作者，胥將獲其沾溉而受益無窮焉。

序

一九九〇年初識吳文治教授於南京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，爾後多次在學術會議相晤。以研究範圍、志趣相近，自然而然成爲同道相謀的朋友，七八年來，書函往返，互通學術訊息，並不時交換研究心得與成果。

吳文治教授治學篤實勤奮，早年以研究韓愈、柳宗元暨整理中國文學典籍、資料著名於時。不僅著作數量豐多，且極有學術價值與影響。所著含有精義，所編輒百餘萬字，煌煌巨帙，學者用爲參考，獲得莫大啓發與便利。近幾年致力於主編《中國歷代詩話全編》，其中《明詩話全編》十巨冊，近八百萬字，問世以來，極受學界重視，稱譽備至。現《宋詩話全編》亦即將出版。此編收宋詩話近六百家，七百餘萬字，體制宏偉，內容充實完善，一如《明詩話全編》。憑此一端，亦足見此書的價值與編者的貢獻。

宋詩話全編

吳文治教授爲主編此書，積勞成疾，然仍鏗而不捨。此種爲學術盡瘁精神，誠令人欽敬。

四

戊寅秋 羅聯添序於臺灣大學

序

中國古代文論中，詩論不惟數量大，且亦最具特色。凡具中國特色之文論術語，亦多產生于詩論，或自詩論移植。文論的解讀，往往也以詩論最爲空靈飄忽，難以確切把握。本世紀，特別是近二十年來，學術界對於中國古代詩論的研究，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大而詩論之民族特色、理論體系，小而某一理論範疇如賦、比、興、味、意象、風骨、神韻、格調、意境等等的闡釋，或一個詩論家、一部詩論著作的研究，都有了衆多的論文和專著。新見疊出，異采紛呈。古代詩論的所有重要問題，似乎均已進入研究領域，幾無遺漏。然若進一步考察，則又覺有所不足。立論往往若然若不然，似是而非是。這固然有詩論本身義界模糊之因素，同一範疇，不同人，不同時代使用之含義存在差異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時間、不同條件下使用含義也不同。但也有因材料殘缺，未能對前後左右作多層面、多視角加以考察的原因。研究者研究一位理論批評家，一部理論批評著作，往往局限在他本身和他周圍若干材

料上，少有前後追索、全面系統加以比較者。縱有人留意于此，亦多蜻蜓點水，凡所涉及，多爲人所共知之材料。說到研究對象時說的是內行話，說到前後代的有關問題時說的是外行話。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事。一個人精力有限，而歷代詩論之材料浩如烟海，全靠一人之精力斷難系統全面清理此浩如烟海之材料。詩論、詩話專著和主要的詩論家、主要的論詩名篇，是都涉及了的；而散見于浩瀚載籍中論詩之片言隻語，則遠未爲研究者所知曉。我常常想，一種新的詩歌思想、詩歌理論的出現，必有一個環境、一個過程，絕非孤立現象。環境是指同時存在着與該詩歌思想、詩歌理論相同或相似的道理和思想；過程是指該詩歌思想、詩歌理論必經的萌發、成熟與流變（與另一詩歌理論、詩歌思想連接）。而此環境與過程之面貌，往往便反映在片段言論中。清理此隱藏于浩瀚載籍中論詩之片段言論，是更爲深入研究古代詩論必做的一件工作。

我們的古代文學和古代詩論研究，曾經有一段時間不重視資料的整理，架空立論，最後是留下一堆廢話。近二十餘年來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。作品的輯佚、考辨、繫年，作家生平史料的考索，都有非常堅實的成績。不少學者在這方面成就卓著，令人欽佩。詩話研究在專著的整理、校勘、注釋方面有好幾部出色的著作。但在資料的全面、系統整理上，却不盡如人意。雖出過一些大部頭的詩話類編，按論題分類，但此類著作其實于研究者用處不大。分類難以準確，材料亦多不全。你要的它沒有，人所共知你不需要的它都有。或者正是有鑒于廣泛搜集詩話的此種必要性，吳文治教授開始了工程浩大的《中國歷代詩話全編》的編撰。他主編的《明詩話全編》剛出版，現在七百萬字的《宋詩話全

編》亦已付梓。這實在是詩話研究界的一件大事。

什麼是詩話？向有不同認識。不同的認識涉及不同的研究範圍。從文治先生的編輯凡例看，他採取的是廣義詩話的說法，搜羅除已成書的詩話外，遍及別集、隨筆、史書、類書等諸書中的詩歌理論、詩評、詩歌表現方法研討、詩人事迹、重要詩篇本事，以至具有理論價值的詩語考辨與詩義疏證。以人立目，便于別時代之後先，適當的取捨，以避免蕪雜，必要的考證，以去偽存真。我相信，此書將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方便。它不惟將宋代詩歌理論、詩歌思想的全貌比較清晰地呈現于讀者面前，且對有心于深入研究者來說，亦具甚大之價值。可以之為綫索，再讀原作，省却翻檢功夫，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《宋詩話全編》成書之際，文治先生囑我為序。我雖于文學思想稍有涉獵，而于詩話并無深入之研究，實不足以擔此重任。且久病初愈，力不從心。因不欲辜負先生之重托，故勉為數語，以應先生之命。

羅宗強
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開大學

前言

宋代詩話，在中國詩話發展史上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。不僅論詩之語充斥于詩文別集、隨筆、史書、類書等各種典籍之中，而且形成并發展了詩話的特定體式。這種體式由筆記體演化而來，它的內容比詩論更廣泛，形式上也比詩論更自由靈便。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著錄，宋代原已成書的詩話專書七十八種，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著錄八十二種；今人郭紹虞《宋詩話考》所考，宋代詩話著作「現尚流傳者」為四十二種，「部分流傳，或本無其書而由他人纂輯成之者」四十六種，「有其名而無其書，或知其目而佚其文，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輯者」五十一種，再加上其中附及的數種，總計約一百四十餘種。本書編纂宋代詩話五百六十二家，其中便收錄了原已單獨成書的詩話一百七十餘種。本書收入新輯錄的宋人散見詩話四百餘萬字，約佔本卷全書的三分之二。近四百家原先無詩話輯本傳世的詩論家，從此有了輯本；一百七十餘家原先有詩話專著傳世的詩論家，經補充輯錄其散見詩話後，內容亦更為充實。

詩話，就其狹義而言，本指我國古代詩學理論批評的一種專著形式。許顥在《許彥周詩話》的開

端，曾給詩話下過一個定義，他說：「詩話者，辨句法，備古今，記盛德，錄異事，正訛誤也。」其實詩話最初之作，其用意不過是如歐陽修所說的「以資閑談」（《六一詩話》卷首小序），并無意于創格，所以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它是「體兼說部」。但歐陽修此體一出，後繼者競相仿作，蔚為風尚。發展到後來，作者已不限于「以資閑談」，內容也遠不限于許顛所說。

詩話這種體式形成以後，明顯地看出它之所以稱「詩話」而不稱「詩論」，是由于它比起嚴格的詩論來，筆調更見輕松、靈便，如郭紹虞《宋詩話輯佚序》所說，「在輕松的筆調中間，不妨蘊藏着重要的理論，在嚴正的批評之下，却多少帶些詼諧的成分」。但「詩話」與「詩論」畢竟是不能截然分割的。「詩話」并不一定都必須是個人專著，例如蘇軾，生前並沒有寫過詩話專著，今傳《說郭》本《東坡詩話》一卷三十三則，便是後人從《東坡題跋》等書中輯錄其論詩之語而成，又如洪邁，也并未寫詩話專著，今傳《容齋詩話》六卷，便也是後人于《容齋五筆》中輯錄其論詩之語而成，再如趙令時著有《侯鯖錄》八卷，日本人近藤元粹以其中多論詩之語，遂輯成《侯鯖詩話》一卷，編入《螢雪軒叢書》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，即古代詩論家的有些重要詩論，往往都并未寫入他的詩話專著，而是散見于他們的文集或隨筆之類的著作中，如歐陽修論詩最著名的觀點「窮而後工」，并未見于他的《六一詩話》，而是在他所作的《梅聖俞詩集序》和《薛簡肅公文集序》二文中集中加以闡述的。正是因為有見于以上所述種種，故本書援前人先例，凡從諸家著述中所輯論詩之語，亦一概稱之為「詩話」，這實際是比較廣泛意義上的「詩話」。錢仲聯先生也曾說過：「專名為詩話的書，只能以《六一詩話》為

首創。」但散見諸書中的說詩之語也應承認是詩話，如「《說苑》所載子文歌、越人歌，《新序》所載徐人歌之類，就是故事性的詩話」；「《論衡·藝增》鶴鳴九皋節、維周黎民節，就是評論性的詩話」；「顏氏家訓》祖孝徵論沈約詩條、論梁簡文《雁門太守行》條、王籍《入若耶溪》詩條、評蕭愨詩條、評何遜詩條，也是詩話」（《宋代詩話鳥瞰》）。這一見解是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。也正是因為有見于此，所以郭紹虞先生生前也曾有纂輯《詩話新編》的宏偉構想，即「把昔人各種筆記中論詩論文之語彙輯成編，而另加以一種詩話的名稱」（《宋詩話輯佚序》）。祇是因天不假年，未能遂其心願。故本書的編纂，實際是繼承了郭紹虞先生未竟之業。

詩話發展到宋代，之所以能開創出一個嶄新的局面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隋唐五代詩歌創作的興旺發達，給詩話的研究對象、詩歌評論、詩歌鑒賞開拓了廣闊的研究領域，為詩話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宋代詩學理論的成果，都可以說主要是在探索研究唐詩創作成就的基礎上取得的。

其次，宋代詩歌創作實踐的發展，不同詩歌流派、詩學見解相互論爭，也促進了宋代詩話的發展。唐詩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座巍峨的豐碑，宋代詩歌繼唐詩之後如何走自己發展的道路，這是宋代詩人和詩論家們所苦思力索的一個重大問題。五花八門的詩歌主張由此而生，詩話正適應了發展這些詩歌主張的需要。

第三，唐人已有的論詩之著，對宋詩話的出現和發展也起了一定的啓迪作用。比如孟榮《本事

詩》，雖可說源本小序，但實際也是在隨筆式小說影響下專供茶餘酒後談資之作。宋詩話雖然已不再僅限于論詩及事，但它却是在《本事詩》等詩話的基礎上提高和發展起來的。

第四，尤其是詩話這種比較自由輕松的體式的出現，對詩話之所以能興盛于宋代，有着更為直接的作用。由于詩話這種體式不僅在內容上比較寬泛自由，可深可淺，在文字上也比較通俗易解，雅俗共賞，如章學誠所說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（《文史通義·詩話》）。這種體式為論詩開了方便法門，因而它不僅能擁有廣大的讀者，而且也擁有廣大的作者。一些原本不擬撰作詩論或無暇撰作詩論的人，都可以利用這種靈便的形式，信筆所之，言所欲言，詩話之作自然就多起來了。這說明詩話之體一旦形成，便有其較為旺盛的生命力，使它自宋初崛起之後，得以長盛不衰。

宋代原已成書的詩話專著，大體可分為詩話別集和詩話總集兩大類。

各家詩話別集，往往在內容上各有側重：有以紀事為主者，如司馬光《溫公續詩話》、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等；有以談理論為主者，如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、朱熹《清邃閣論詩》、姜夔《白石道人詩說》等；有以評論詩人詩作為主者，如黃徹《蛩溪詩話》、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、范晞文《對林夜語》等；有以考證用事出處為主者，如劉攽《中山詩話》、吳升《優古堂詩話》、周紫芝《竹坡詩話》、吳聿《觀林詩話》、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、周必大《二老堂詩話》等。但詩話畢竟是隨筆閑談式的著作，作者可以信筆所之，言所欲言，因而大多數詩話，往往各種內容都兼而有之，如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，便既有記事，亦有考證；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，則評論與考證等均兼而有之。

至于詩話總集，即以輯集爲主的詩話匯編，也有好幾種類型：有按內容分類的綜合性的詩話匯編，如阮閱《詩話總龜》等；有按詩人時代先後爲序的詩論詩事匯編，如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等；有專輯某一代詩人詩事的詩話，如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、尤袤《全唐詩話》等；有匯集并辨正對某家詩人評騭的專輯，如方深道《集諸家老杜詩評》、蔡夢弼《杜工部草堂詩話》等；有選本性質的詩話匯編，如何谿汶《竹莊詩話》、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等；有屬於詩論和摘句的分類選編，如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等。這些詩話總集，保存了不少今天已佚的一些詩話，頗有資料價值和詩學研究價值。

宋代詩話的發展，根據宋代詩話的內容以及各個詩派及其詩歌創作等情況，大略可以分作北宋前期和中期、北宋後期、南宋前期、南宋後期四個時期。

(一)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詩話

宋初詩壇，仍沿襲晚唐、五代以來淫放頹靡的遺風，作詩多在詞藻典故上下工夫。王禹偁是首先出來反對這種詩風的代表性人物，他提倡學習「韓柳文章李杜詩」（《贈朱巖詩》），在詩歌創作上繼承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的傳統，并以此指導後進。但他的號召，在當時并未能得到很多人的響應，因而後來楊億、劉筠等宮廷侍臣們，得以在原已華靡淫放的詩風中推波助瀾，使更加注重形式、片面追求華靡詞藻的「西昆體」盛行起來。正是在詩壇的這種背景下，歐陽修等提出了詩文革新新的理論，倡導詩文革新運動。他的詩文理論，實際是繼承并發揮了王禹偁所標舉的「韓柳文章李杜詩」的主張。

繼王禹偁之後的梅堯臣、蘇舜欽，是宋初詩人中擺脫了「西崑體」詩風的著名詩人。他們的創作和理論，顯示出一種關注現實、樸實清新的氣息。歐陽修在詩話中總結他們的成就，對他們備加推崇，謂「聖俞、子美齊名于一時，而二家詩體特異。子美筆力豪雋，以超邁橫絕為奇；聖俞覃思精微，以深遠閑淡為意。各極其長，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」（《六一詩話》）。歐陽修如此評價和贊美這兩位詩人，實際是把他們作為宋詩發展新方向的代表性詩人來標舉的。梅堯臣論詩，提倡「意新語工，得前人所未道」，要求「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，見于言外」；認為「詩句義理雖通，語涉淺俗而可笑者，亦其病也」。梅堯臣的這些論詩之語，都被歐陽修收入他的《六一詩話》。「意新語工」，這是梅堯臣論詩的精髓，是詩歌藝術的生命，也是歐陽修在詩文革新運動中所刻意追求并倡導的。

其實細細比較起來，歐陽修論詩的主張，與梅堯臣似乎也同中有異。梅重義理亦重視其用語，無論內容或語言，都以「前人所未道者」為高；歐陽則似更重視義理，反對以詞礙理，認為「詩人貪求好句，而理有不通，亦語病也」。并舉唐人張繼詩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二句為例，謂其造語雖佳，其奈「三更不是打鐘時」。歐陽求疵，自屬不當。他要求詩必通義理的詩學思想，後來竟演化成了宋詩的一大特色。

宋儒理學勃興的機運始于仁宗朝，恰好與歐陽修倡導詩文革新同時，他重義理，可能也曾受到時代思潮的一些影響。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等都出自歐陽修門下，他們受到歐陽修的影響是很自然的。歐陽修仰慕韓愈的詩歌文章，提倡把韓愈「以文為詩」的做法引進詩歌領域。因而發議論，競用

典，後來竟成了他們共同的癖好。由于歐陽修及其追隨者們提倡以散文句法入詩，主張白描，以廓清晚唐、五代的浮靡雕飾之風，他們所宣揚的這方面的詩學理論，成了這個時期詩話的中心，影響極為深遠。因而宋詩趨向于散文化，致與唐詩之面貌完全不同。故自明代以來，尊唐詩者，常以此攻擊宋詩。

蘇軾平生雖沒有寫過詩話專著，散見諸書中的論詩之語，在北宋詩論家中却屈指可數。本書便從其著作中輯得散見的論詩之語四百八十餘則。他論詩，固不同于陳腐的理論家，也不同于專以治教政令爲主的政治家，雖與歐陽修比較接近，但又有很大發展。他強調「詩須要有爲而作」（《題柳子厚詩》），要求「言必中當世之過」，「如五穀必可以療饑」，「如藥石必可以伐病」（《鳧巖先生詩集叙》），反對理學家們「多空文而少實用」（《答王庠書》）。他很重視詩歌的內容及其社會作用，但同時也更重視詩歌的藝術特征，認爲作詩和作畫一樣，應該做到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」，詩人應該在以「變」爲詩家之「能事」的思想指導下，敢于自出己意以爲詩，不在形式上死守前人的「法度」（《書吳道子畫後》），所謂「冲口出常言，法度越前軌；人言非妙處，妙處在於是」（《詩頌》）。他講究「天工」（《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》二首之一），即不有意求工而自工，亦即他在《江行唱和集叙》中所說的「非能爲之工，乃不能不爲之工」，這是一種自自然然的美態。這些論說，顯然比梅堯臣所提倡的「意新語工」的思想有了更深一層的闡發，揭示了在規律法度的基礎上，作家應充分發揮藝術創造的主張。他崇尚自然，反對雕琢，力求語言表達有充分的自由，所謂「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」（《答謝民師

書》。這概括了他的創作主張，他的詩文創作也確實體現出了這樣的藝術特色。為此，他鄙薄王安石「好使人同己」，反對他企圖以自己的思想去統一學界文壇，認為那樣會使文壇變成「荒瘠斥鹵之地，彌望皆黃茅白草」（《答張文潛書》）。蘇軾推崇杜詩有託諷之義，為古今詩人之首，傾慕李白詩歌的揮灑自如，超絕豪邁。而以文字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，以議論為詩（《滄浪詩話·詩辯》），則是他近似韓愈之處。晚年由于政治生活和思想的變化，他又極力推崇陶淵明，仰慕魏晉詩人的「高風絕塵」，贊賞韋應物、柳宗元詩的「簡古」、「淡泊」。他認為陶柳詩之所以可貴，就在於他們的詩「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實美」（《評韓柳詩》）。這個「淡」，是涵眾美之淡，是與「至味」聯係在一起的。蘇詩作為宋詩中的一大流派，蘇軾論詩重視詩歌藝術，發表了不少獨具匠心的藝術見解，對推動詩文革新，形成宋詩的特有風貌，都曾產生巨大的影響。

黃庭堅青年時便與蘇軾結交，為蘇軾所器重，與秦觀、晁補之、張耒并稱為「蘇門四學士」。他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，有與蘇軾相同的一面，但就其總的傾向來看，則與蘇軾走着一條不同的道路。他推重蘇軾，却不滿于蘇詩的「好罵」，甚至告誡他的外甥洪芻「勿襲其軌」（《答洪駒父書》）。他也沒有詩話專著，但從本書所輯二百餘則散見詩話來看，發表的詩學理論相當系統。他論詩多談法度，認為詩有詩法，把杜詩作為學習詩法的範本。他最醉心于倡導的作詩法度，便是所謂「點鐵成金」和「奪胎換骨」二法。這是他給江西詩派詩人們奉為金科玉律的不傳之秘。所謂「點鐵成金」，簡言之，便是提倡作詩者應善于學習和運用古人的遣詞造句，把古人的詞句加以改造點化，用到自己的詩作中